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包伟民 选编

史学文存

1936-20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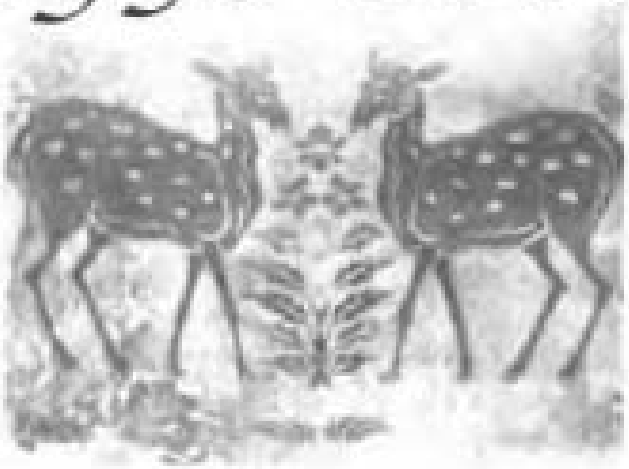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包伟民 选编

史学文存

1936-2000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包伟民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
ISBN 7-5325-3029-9

Ⅰ．史… Ⅱ．包… Ⅲ．中国—古代史—研究—文集
Ⅳ．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5082 号

史学文存：1936～2000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
包伟民　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75　插页 5　字数 450,000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325　3029-9
K·342　定价：36.00 元

选编说明

中国古代史专业在浙江大学的发展，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1928 年 8 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创设本科史学与政治学门，1936 年 8 月，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正式创设史地系，合历史学与地理学为一科，在当时的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了鲜明的学术风格。1949 年后，浙江大学各系科屡经调整。1951 年夏，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文教厅合办浙江师范专科学校，以原浙江大学史地系史学组一部分教师为骨干建立历史专科；1952 年 2 月全国院系调整，浙江师专历史科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同年夏，改为历史学系；1958 年，新建立的杭州大学与浙江师范学院合并，设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在此后稳定发展的四十年间，杭州大学历史学系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成为国内外关于宋代史、中外关系史及东南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中心，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史学人才。1998 年秋，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及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院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稍后不久组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一个重要系科。2000 年 3 月，成立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现有研究人员 13 名。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史学文存：1936－2000——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论文集》，有两方面的原因：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在

其长达半个多世纪、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先后有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在此执教,留下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为了促进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我们有必要集中展示本专业的这些学术积累;近十几年来,古代史专业曾编辑出版过几辑宋代史及中西关系史方面的专业论文集,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但由于经费困难等原因,部分工作停顿。自去年3月成立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以来,在校方的支持及本所同仁的努力下,学科建设面貌一新,专业研究成绩斐然。故沿袭原先出版专业论文集的传统,先将本专业自建系以来的代表性论作,集成一册,以纪念浙江大学史地系建系六十五周年,稍后,我们还将汇集出版本所同仁的研究新作。

论文选编的具体考虑如下:

大半个世纪以来,虽曾有许多著名学者在浙江大学执教,其中有些留掌讲席的时间较短,因此对于先贤,我们仅选其中曾较稳定地在本专业任职者,且尽量考虑其在此任职期间完成的代表作,以免挂漏之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反映原浙江大学史地系地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我们选用了原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史家竺可桢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竺先生此文虽发表于20世纪的七十年代,但他对于中国古代气候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出长浙江大学期间,是他研究中国古代气候的重要阶段,曾有数篇论著发表。本集选入的这篇论文,是竺先生长期研究的一个总结。从竺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反映出浙江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不唯技术、重视人文修养的优秀传统。

本论文集所选文章撰写时代不一,体例各异,为保存原貌,今一仍其旧,仅对其中明显的文字错误略作修订。

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社会,史学不断走向边缘化。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在由现实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史学家所面临更重要的却是来自学术界内部的挑战，也就是批判、反思旧学术传统，以创建新的史学体系。我们愿与学界同仁一起为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而奋斗。

包伟民

2001 年 6 月

目　录

选编说明 …… 包伟民（1）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 竺可桢（1）
中国历史上之国防区域…… 张其昀（44）
战国时代的思潮…… 张荫麟（65）

《万斯同年谱》序…… 陈训慈（89）

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 谭其骧（94）
南宋定都临安的原因 …… 陈乐素（107）

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 …… 方　豪（119）
从钱帛兼行到钱楮并用 …… 李　埏（143）

殷契卜辞中的《周易》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渊源 … 黎子耀（177）
《宋史·地理志》补正 …… 徐　规（205）
北宋馆阁制度述略 …… 倪士毅（232）

论赵宋之统一与整治 …… 杨渭生（249）

两宋的租佃形式 …… 梁太济 (273)

史学的宗旨: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 孙达人 (288)
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 …… 黄时鉴 (317)
《越绝书》散论 …… 仓修良 (337)
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 魏得良 (353)
旧大陆的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传统 …… 戴尔俭 (371)
清代官营杭州丝织工业的生产方式与经营管理 … 蒋兆成 (387)
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 …… 龚延明 (408)
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 …… 何忠礼 (434)
古代中韩典籍交流概说 …… 黄建国 (457)
也谈钱镠"保境安民"国策 …… 李志庭 (479)
唐代胡化婚姻关系试论——兼论突厥世系 …… 卢向前 (492)

宋代的粮食贸易 …… 包伟民 (520)
关于鸦片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若干问题 …… 龚缨晏 (545)
六朝钱塘县治治地考 …… 阙维民 (575)

作者简介 …… (586)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

一、前　　言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公元 1030—1094 年)、刘献廷(公元 1648—1695 年)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但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1]。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成绩毕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的判断。例如，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却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2],这是不对的。当时作者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3]。

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和研究机关,为科学研究创造了广阔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解除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权威思想的束缚,我国科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二十世纪初期,奥地利的汉恩(J. 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记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学科好像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引起地球物理科学家的注意。在六十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

记载，以及太阳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年，《天文学报》发表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十八世纪以前的90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4]。1956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包括公元前十二世纪到1955年之间的1180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以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5]。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3000至1100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1900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气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

二、考古时期(约公元前 3000—1100 年)

解放后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的不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发掘。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一个最熟知的遗址。根据1963 年出版的报告,在 1954 年秋到 1957 年夏之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个遗址上,进行了五个季节的发掘,大约发掘了10000 平方米的面积,发现了 40 多个房屋遗址,200 多个贮藏窖,250 个左右的墓葬,近 10000 件的各种人工制造物[6]。根据研究,农业在半坡的人民生活中显然起着主要作用。种植的作物中有小米,可能有些蔬菜;虽然也养猪狗,但打猎捕鱼仍然是重要的。由动物骨骼遗迹表明,在猎获的野兽中有麝(又名河麂,*Hydropotes inermis*)和竹鼠(*Rhizomys sinensis*)……书中认为,这个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用^{14}C 同位素测定为 5600—6080 年前);并假定说,因为水麝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见文献[6]第261 —264 页)。

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另有一个熟知的古代遗址——殷墟。它是殷代(约公元前 1400—1100 年)故都。那里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杨钟健和德日进(P. Teilhar de chardin)曾加以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前北京地质调查所报告之中[7]。这里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麝和竹鼠外,还有獏(*Tapirus indicus Cuvier*)、水牛和野猪。这就使德日进虽然对于历史时代气候变化问题自称为保守的作者,也承认有些微小的气候变化了。因为许多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见文献[7]第 56 页)。

然而对于气候变化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

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前胡厚宣曾研究过这些甲骨文，发现了下列事实：在殷代时期，中国人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知道加上一个闰月（称为第十三个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因而一年的第一个月是现在的阳历的 1 月或 2 月的上半月。在殷墟发现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的。在能确定日期的甲骨中，有 137 件是求雨雪的，有 14 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在这段时间内降雪很少见（见文献[1]第 35 页）。当时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 3 月份开始下种；比现在安阳下种要到 4 月中，大约早一个月。论文又指出，在武丁时代（公元前 1324？—1365 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不是象德日进所主张的，认为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其含义的（见文献[1]第 47—48 页）。

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像动物能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对于半坡地层进行过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并不很多，故对于当时的温冷情况，不能有正面的结果，只能推断当时同现在无大区别，气候是半于燥的（见文献[6]第 270--272 页）。1930—1931 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 35°25′、东经 119°25′）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①]。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假设，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 1°—3°。如果检查黄河下

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的平均温度减低 3°—5°C，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 2°C。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黄河流域当时近于热带气候，虽未免言之过甚，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温度减低 3—5°C，一定使冬季的冰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那些相信冰川时期之后气候不变的人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同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幅度较小而已。现代的温度和最近的冰川时期，即大约一、二万年以前时代相比，年平均温度要温暖到摄氏七、八度之多，而历史时期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至多也不过二、三度而已。气候过去在变，现在也在变，将来也要变。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不过气候变化的详细情形，尚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

三、物候时期（公元前 1100 年—公元 1400 年）

没有观测仪器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用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叫物候。我国劳动人民，因为农业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十一世纪时便开创了这种观测。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均载有从前物候观察的结果。积三千年来的经验，材料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

随着周朝建立（公元前 1066—249 年），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就来到物候时期。当时官方文件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由这些

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显著作用。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具、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

气候温和由中国最早的物候观测也可以证实。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至”点（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年里确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办法，能把春分固定下来，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日期。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②。别的小国也有用别的办法来定春分的。如在山东省近海地方的郯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皞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③。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等地。郯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 E. 威尔金森（S. 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家燕在 3 月 22 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8] 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郯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了。把这两个地点的同一时期（1932—1937 年）温度比较一下（见表 1），看一看它们有多少差别，那是有意义的。

表 1 郯城、上海平均温度比较表(°C)

地 点	纬度(北)	经度(东)	海拔(米)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年平均
郯 城	34°38′	118°26′	20.0	−1.4°	1.0°	6.6°	14.1°
上 海	31°32′	121°26′	7.0	3.2°	4.2°	8.1°	15.6°
差 数	3°6′			4.6°	3.2°	1.5°	1.5°

表 1 列出的结果,正好同上面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水,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 903 和 897 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风》是周初成王时代(公元前 1063—1027 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邠)的地点据说是一个离西安不远,海拔 500 米高的地区。当时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们可以从《豳风》中的下列诗句中看出来:

八月剥枣,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接着又说: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陵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

这些诗句,可以作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代邠地的物候日历。如果我们把《豳风》里的物候和《诗经》其他国

风的物候如《召南》或《卫风》里的物候比较一下，就会觉得邠地的严寒。《国风·召南》诗云，“摽有梅，顷筐塈之”。《卫风》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梅和竹均是亚热带植物，足证当时气候之和暖，与《豳风》物候大不相同。这个冷暖差别一部分是由于邠地海拔高的缘故，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初时期，如《竹书纪年》所记载过有一个时期的寒冷，而《豳风》所记正值这寒冷时期的物候。在此连带说一下，周初的阴历是以现今阳历的十二月为岁首的，所以《豳风》的八月等于阳历九月，其余类推①。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481 年）又和暖了。《春秋》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 698，590 和 545 年时尤其如此⑤。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

宋朝（公元 960—1279 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⑥。下文要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到战国时代（公元前 480—222 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从《诗经》中所提粮食作物的情况，可以断定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人民种黍和稷，作为主要食物之用[9]。但在战国时代，他们代之以小米和豆类为生。孟子（约公元前 372—289 年）提到只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